

“囚徒困境”的幕末公共危机应对： 以萨摩、长州攘夷为例

高小岩¹，全美英²

(1.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2.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服务管理学院，北京 100097)

摘 要：“生麦事件”导致英国和日本萨摩藩关系急剧恶化爆发萨英战争，另一雄藩——长州藩也因攘夷行为招致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的报复。经过战争较量，使萨摩、长州的武士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列强的巨大差距，随即摒弃盲目排外政策，向西方学习，从而引领明治维新，使日本跻身列强行列。

关键词：英国；萨摩藩；长州藩；囚徒困境；危机应变

中图分类号：K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3-0103-05

嘉永六年(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率4艘战舰打破了日本浦贺港的沉静，由于佩里舰队船只被涂成黑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日语：黒船来航/くろふねらいこう)，继美国叩关之后，英、法、俄、荷等国接踵而至，逼迫江户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日本的锁国政策至此寿终正寝。面对外国的蚕食与商业渗透，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与忧患意识，惊呼“堂堂神州，受戎狄之辱，……”，提出“欲协作国家复兴之万一”^[2]，于是，萨摩藩、长州藩武士为主力的倒幕派打出“尊王攘夷”旗号^[3]，打算振兴国家抵御外侮。

一、武家之怒：“萨英合战”

文久二年(1862)年9月14日，有四个英国人位于生麦村(今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他们分别是查理斯·理查逊(Charles Richardson)，一个往返横滨和上海的商人，查理斯·理查逊的店员克拉克(Clark)以及一对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Marshall)夫妻。他们正巧遇到了“参觐交代”路上、向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传达朝廷旨意的萨摩藩主岛津忠义之父兼辅佐人岛津久光和他的700人仪仗队。仪仗队站满了整条道路。按照日本当时的规

矩，“参觐交代”是各藩藩主到江户觐见幕府将军的制度，非常讲究威仪，一般平民路遇大名“参觐交代”的仪仗队，必须下跪且回避，甚至头都禁止抬起，稍有不敬就会被护卫武士“无礼讨”(斩杀)，可是这四个英国人不肯避让，这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礼行为。而且道路狭窄不足10米，两者并行通过很困难。看到对方是外国人，岛津卫队的先导起先保持克制，手语让其离开，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沟通没起作用。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侧身不得过时，不知什么原因，马歇尔夫人的马突然受惊冲入仪仗队，转眼间人马嘶鸣，引起人群秩序大乱。由于离藩主坐轿很近，为防止混乱中藩主遭遇不测成了武士动刀的理由，岛津卫队的武士奈良原喜左卫门、海江田信义旋即冲出拔刀砍伤查理斯·理查逊。受伤的四个英国人落荒而逃，但是，查理斯没跑几米远就因刀伤难忍跌落马下，被飞奔到的萨摩武士拖入路边农田里杀死，(也有一说是奈良原喜左卫门的胞弟奈良原繁将其杀害)，其他两位——克拉克和马歇尔也身负重伤，逃入神奈川宿本觉寺的美国领事馆寻求紧急救治，英国妇人慌乱中丢失帽子，发丝被武士刀削去寸许，惊魂未定中骑马告警。基于此次袭击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事态非同小可，英国方面闻讯后

收稿日期：2017-03-16

作者简介：高小岩(1978-)，甘肃兰州人，副教授，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2009-2010)与美国罗格斯大学(2016)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和民族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和赔偿损失。

受限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决策者无端猜疑,格外容易导致战略误判的发生,进而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发生机理类似于管理学中的经典情景“重复性囚徒困境”,是博弈双方在不透明环境下基于对手意图的有害推定,从而使得事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此类典型困局尤其容易在封闭条件下被屡次复制,造成重大损害结果。考虑到“生麦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执行了超过200多年的孤立政策,习惯性孤立已经成为某种思维定式,盲目排外情绪很容易找到生存土壤。与日方斡旋无果后,英国考虑到军事介入,但是限于当时中国战事正紧,打算等在当时对付太平天国的舰队抽出身后再付诸实施,因此直到一年后的文久三年(1863)年8月11日,由奥古斯特·库帕(Augustus Leopold Kuper)任指挥官、7艘军舰组成的、配有24门阿姆斯特朗大炮的英国舰队才抵达日本。阿姆斯特朗炮是一种大型线膛炮,1855年由英国的威廉姆·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发明,此炮曾在鸦片战争攻破清军大沽炮台时建功。有了舰队为后盾,时任英方公使约翰·尼尔(Edward St John Neale)迫使江户幕府支付10万英镑赔偿金后,到达鹿儿岛,要求萨摩藩赔偿25 000英镑,逮捕惩罚肇事者。岛津久光辩称“生麦事件”的武士只是依惯例行事,并无过错可言,并提议双方到城内会谈,被英方回绝。英方态度强硬,要求立即答复并按照英方提出的一一照办。可能是翻译不当引起的外交误会(英语翻译福泽谕吉错将英方信件里要求处死事件凶手翻译成处死藩主岛津忠义),这对萨摩藩来说,等于把和谈的路堵死,再加上萨摩藩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军火企业——“集成馆”,沿海岸线有10个炮台,85门巨炮,这多少给了岛津久光一点底气。8月13日,萨摩藩准备奇袭英国舰队,“生麦事件”肇事人奈良原喜左卫门、海江田信义伪装为平民靠近英舰,因引起英军警惕而宣告计划失败。8月15日,英国舰队扣住了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萨摩藩在战前细致准备。加固炮位胸墙,使掩护效果大为增强。且在英国舰队来前多次演练和标定了射击位置,命中率明显提高,对各种突发情况都有预案;还在战前几天疏散了人员。中午,装有80门大炮的萨摩藩岸防炮台先发制人,炮击英舰。英国舰队措手不及,幕府支付的10万英镑赔偿金分装在若干大箱子里堆积如山,正巧把弹药库的门堵住,英军官兵在剧烈颠簸中

费了很长时间才移开箱子,说明英军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到下午2点才开始使用其装备的100门舰炮还击。开战时海面风雨很大,英国舰队摇晃严重、准备不足的火炮命中率很低。英国舰队停泊处却正好是萨摩藩平时举行火炮射击训练的地方,而且所在海域狭小,不利于发挥英军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加之英军挟鸦片战争胜利余威,官兵普遍轻敌大意,原本以为凭借以往披靡战功与坚船利炮就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威慑对方屈服,达到战略意图。因此直到受袭时,连萨摩军的炮台数量、位置、射程等情报都没有来得及搞清楚就仓促迎战。开战不久,萨摩藩的大炮就命中了英军旗舰Euryalus号舰长室,击毙旗舰舰长与大副以下多人,随即整个舰队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不利境地,为了保存实力再战,英国舰队不得不撤退到樱岛附近的海域休整。次日,双方再次展开炮战,英军依然未能在军事上碾压萨摩军,不幸的是,阿姆斯特朗大炮还在轰击萨摩军时发生卡弹炸膛,也造成损失。萨摩藩方面,死伤者虽然只有十几名,但是除损失汽船三只和琉球贸易船五只外,几乎所有炮台被破坏,集成馆和铸钱所也被烧掉。并且在火矢打击下^[4],城内500多间房间烧毁,损失也不小。到了8月17日,英国舰队弹药几乎完全耗尽,被迫再次从战场上撤退。此役英军战死13人,萨摩军5人,英军首战并未如预期那样占到什么便宜,倒是充分领教萨摩军战斗力。萨摩军中后来成为日本首位元帅的大山岩与著名海军将领的东乡平八郎、山本权之助在当时都是以主副炮手的身份,亲身参与了与英国舰队的鏖战。

海战结束之后,岛津久光等人从打捞起的英军炮弹分析,英国舰队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射程、射速、精度与口径都远远超过萨摩藩的火炮,锥形炮弹的爆炸威力远超萨摩藩制造的球形炮弹。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射程达到4 000米,竟然是萨摩藩大炮射程的4倍。藩主和整个决策层都清醒意识与英国的巨大实力差距,认识到一时得胜只是侥幸。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化解僵局,因此萨摩藩决定向英军道歉赔款,并且将派出留学生提上议事日程。1865年3月,萨摩藩留英学生出发;1866年,萨摩藩专门设立了“异人馆”,学习先进技术。他们已超越了萨摩藩的利害,把目标指向了日本全民族的利益^[5]。他们要通过本藩政治改革来探索日本的出路,以藩政经验来匡济天下^[6],真正实现“尊王攘夷”的理想。

二、攘夷之殇:“四国舰队炮击下关”

无独有偶,促使萨摩藩的岛津家族敢于放手一搏,还与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关,即另一雄藩——长州藩的毛利氏以“尊王”名义发动的所谓“攘夷战争”。长州藩禁止外国船只在下关自由通行,文久三年(1863)年6月向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彭布罗克”号开炮,7月又炮击法国军舰“建昌”号和荷兰军舰“密托沙”号。长州藩的炮击行为既标志着“攘夷”活动的顶峰,给了萨摩藩铤而走险的暗示,但也预示着“攘夷”走入危途。时任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得悉袭击后认为,倘若放任长州藩的军事冒险行为,很可能导致日本开国政策倒退,最后祸及列强在日本失去立足点,痛失业已取得的对日贸易成果,尤其是与日贸易一度超越美国而居首的英国利益受损最为惨重,为了彻底根绝这种不利结果,英国必须带头组织各国出兵惩罚长州的妄举,防备日本其他地方藩国以倣效尤。因此,英、法、美、荷四国联合照会幕府当局,宣布四国舰队将对最顽固的长州藩实施惩罚性攻击。

在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的进攻和幕府征长大军压迫下^[7],藩主毛利敬亲委派下关奉行高杉晋作组建西洋武器装备与训练的“奇兵队”迎战。在7月16日首轮交锋中,美国军舰“怀俄明号”冲破下关海岸炮台的火力网,摧毁了龟山炮台,又乘势击沉“庚申号”“壬戌号”,击伤“癸丑号”,并将下关一带的长州藩守备部队打得溃不成军。7月20日,焦莱斯少将率领法国远东舰队的“赛米勒米斯号”“坦克莱德号”等军舰闯进下关海峡,用猛烈的炮火将沿岸炮台尽行摧毁。联合舰队摧毁了长州藩在下关经营多年的所有海岸炮台群,缴获大炮60余门^[8]。第一阶段战事结束后,四国联合舰队着手计划次年发起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元治元年(1864),英国派出9艘战舰,法国派出3艘战舰,荷兰派出4艘战舰,美国派出1艘,拥有282门火炮、5000人兵力(2000人为陆战队),以一年前指挥萨英战争的奥古斯特·库帕(Augustus Leopold Kuper)为总司令指挥四国联合舰队。7月28日,四国舰队从横滨起航,前往下关。8月5日14时,趁着海上涨潮,联军舰队分兵进攻。此次联军吸取了去年萨英战争的教训,在长州炮台射程外下锚,这样便可以确保发挥线膛炮优势。阿姆斯特朗式炮使用榴弹给长州藩巨大杀伤。由于长州藩火炮射程不够,无法给联军造成致命打击。联军将领开会判断如果此时再不及时登陆摧毁炮台,很可能会贻误战

机,已得的胜利也会付之东流。就在此时,联军“鞑靼”号和“杜普雷”号因锚链搅在一起,导致漂流到长州炮射程内,长州军立即集中火力炮击两舰,不过联军登陆行动并未因此受到多少影响。长州藩的将领原以为只要外国军队上岸,便可凭日本武士令对方胆寒的白刃战锁定胜局,但是联军先进火器优势太大而并未得逞。战后盘点,长州军亡14人,伤40余人。联军亡16人,伤60余人。联军毙亡多数是在“鞑靼”和“杜普雷”两舰故障遭炮击所致。而长州伤亡少肇因于炮台守军慑于联军炮巨大威力四散逃命才有此结果。下关战争至此结束,长州藩袭击外国船只的行为在招致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的激烈反弹后,以四国联合舰队达到预期战略目的、日本长州藩失利告终。

战事结束后,由于担心使者沦为激进攘夷派的暗杀目标,长州藩无人敢去谈判。最后,藩主只得请高杉晋作再次出面。见邦国于危难中,借助亲友帮助刚刚获释在隐居的高杉晋作无法继续置身事外,担负起与列强和谈的重任^[9]。高杉晋作答应了联军提出的赔偿要求,并且向联军保证不恢复被摧毁的炮台,从此让各国船只自由出入下关,但是对联军提出的租借日本领土的要求丝毫不退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高杉晋作在文久二年(1862)曾经搭乘“千岁丸”到过上海,对外国在中国的“国中之国”有深切忧虑:“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10]。而他作为一名年轻武士对于这种情况忧心忡忡^[11]。物质赔偿与出让国土孰轻孰重,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于是他灵活又不失原则地与联军反复斡旋,终于使联军放弃了租借日本领土的要求,接下来他又以攻为守,以长州地小贫瘠为由,将300万美元赔偿金转嫁给幕府。谈判可以看作军事行动外的另一战场,长州藩有条件地与对方周旋,坚守住了底线。以下关战争(“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为分水岭,预示着尊王攘夷作为一种运动已基本消亡^[12]。经过与外国直接较量,长州藩认识到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距甚远,如不能增强国力,便会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境地^[13]。双方实力悬殊,仅凭自身依靠军事“攘夷”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还有悖国际潮流。长州藩谈判代表高杉晋作随即调整对策,从刚性对抗向刚柔相济转变,在保有底线的前提下适度让步,有条件与对方博弈,争取最有利于己方的处置结果,谈判结果既对列强的赔款要求有所满足,就长州藩维护自身利益而言也能接受,体现

了高杉晋作作为幕末杰出武士的个人能力,也可视为经过军事交锋后,长州藩内开明攘夷派意见一时压倒保守排外派意见的某种反映。

三、“危”中有“机”的进退之道

首任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曾说,“具有亚洲人血统的任何国民和民族,不经过顽强的反抗,决不会向欧洲人屈服”^[14]。萨摩藩与长州藩即便从道义或是实力毫无胜算的情势下,也是以传统武士的强悍思维来行事,即让对方付出代价,以此给自身保有尊严与体面,在与对方的心理较量当中无形中占得了先机。萨摩藩反击犀利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争取到双方均势格局下的对等博弈。博弈论认为,双方只有在对等情况下,才存在谈判的可能,萨摩藩与长州藩的行为让信奉实力主义的“洋夷”不可轻视这个远东民族,进而产生与其结盟的想法。

追溯萨摩、长州两雄藩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二者殊途同归的规律,萨摩藩和长州藩在幕末是沿着改良与革命的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行进的。而萨摩藩的志士领袖则是在执行藩主的改良主义路线失败以后,直到维新前夕才转向长州路线的^[15]。不同的起点,相似的际遇,促成两者最终走到了一起,实现了萨长联合。政治上的失策、军事上的失败,加上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政治体制,使长州、萨摩这样的雄藩首领终于明白:要想在日本国内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必须走所谓“强强联合”的道路^{[8]79}。“萨英战争”与“四国舰队炮击长州”后将生存危机转化为崛起契机,加强了萨摩藩与长州藩在讨幕斗争的引领作用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列强中的英国也调整了以往对日关系中过分倚重幕府的单线思维,转变为以萨摩为支点向各藩延伸的多点并进方式。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说:“以西欧的军事实力打败叫喊攘夷的日本人容易的,但这样做只能受到东方人特有的顽强的敌视。”英国的对日政策应以协助维持现存秩序和“独立”(即不被其

他列强霸占)为上策^[16]。这样才是最大程度、最有可能维护在远东利益的务实策略。英国觉得萨摩等日本雄藩不失为好的合作伙伴,倘若与其合作可以间接支配列岛,也使英国在远东有了抗衡其他列强角逐的战略支点;而和列强中实力最强的英国结盟,使日本具备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某种程度上讲,列强中的英国事实上起到将日本带进世界舞台的作用,称其为近代日本的导师也不为过。本能的调整步伐适应外部变化以应对危机,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处变策略基本印证了这种思维。

不管过程如何一波三折,结果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审慎权衡利益得失、计算利害关系与评估事态前景中,跳出排外与惩暴的对抗式思维怪圈,不约而同地走出零和博弈的泥沼,开辟出倚重对方发展自身的“双赢”模式。从敌对互损到各取所需,至少让双方关系告别不可预测与掌控的阶段,走上平稳发展轨道,这不仅称得上实用主义哲学在国际关系领域娴熟运用的经典案例,也反映了双方认知层面长进与新思维确立,尤其是日方以西方为主的“文明论”取代过去东方惯用的“攘夷论”^[17],甩掉了历史包袱,日本民族特有的、非常善于学习的特征迅速体现出来。作为幕末地方势力的突出代表,在形塑新日本进程中,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也有侧重与分工,“萨摩阀”将精力更多地关注于海军建设,“长州阀”在日本陆军中的权威地位迅速确立^[18]。萨英战争和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对长州的战争^[19],可以发现日本一方面迷信武力至上,另一方面在看到比自己强大的多的力量时,又是最快时间地顺从强权,非常善于学习,在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蠢蠢欲动^[20]。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需要提取的,是其走出“囚徒困境”精神层次上正面、励志、理性的东西,还有符合时代的积极因素,而对其负面、片面、矫枉过正的成分还需要警惕。

参考文献:

- [1] ALCOCK R.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63: 211.
- [2]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292.
- [3] COHEN M.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ary Samurai: a Comparative Reconsideration of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J]. Theory and Society, 2014, 43(2): 139.
- [4] 犬塚孝明. 明治維新對外關係史研究[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87: 87.

- [5] 阎庆悦. 幕末日本的留学生与日本近代化[J]. 日本问题, 1989(3):52.
- [6] 徐勇. 略述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J]. 外国问题研究, 1984(2):17.
- [7] 李秀石. 日本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J]. 世界历史, 1983(3):53.
- [8] 张跃. 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审视日本明治维新[J]. 东北亚论坛, 2006(5):79.
- [9] 罗立东. 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以高杉晋作为例[J]. 历史学研究, 2006(10):56.
- [10] 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附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445.
- [11] 章霖. 试论上海之行对高杉晋作攘夷思想的影响[D]. 杭州:浙江大学, 2014:2.
- [12] 谢跃. 尊王攘夷运动起于何时[J]. 外国问题研究, 1995(2):29.
- [13] 李秀石. 日本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J]. 世界历史, 1983(3):53.
- [14] 井上清, 铃木正四. 日本近代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67.
- [15] 万峰. 幕末维新时期国际关系[J]. 天津社会科学, 1984(1):75.
- [16] 山本武夫. 新研究日本史[M]. 东京:旺文社, 1977:399.
- [17] 张崑将. 从德川到维新初期的“攘夷论”之三重变奏[J]. 外国问题研究, 2016(2):78.
- [18] 王云翠. 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1:25.
- [19] 万峰. 幕末维新时期国际关系[J]. 天津社会科学, 1984(1):75.
- [20] 向卿.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J]. 南昌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 2009(2):128.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of “Prisoner’s Dilemma” at the End of Shogunate: Taking Anglo-Satsuma War and Shimonoseki Campaign as Examples

GAO Xiao-yan¹, Quan Mei-yi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Service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dustry and Trade Technician College, Beijing 100097, China)

Abstract The Namamugi Incident resulted in serious tension to Anglo-Satsum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Coincidentally, the other domain, Chōshū incurs military retaliation of Bombardment of Shimonoseki by combined fleet of Britain, France,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SA because of expelling foreigners blindly. After the war, Samurais in Satsuma and Chōshū soberly realized that there is incredible huge gap for Japanese to keep up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wers and then abandoned xenophobia. They have changed to learn from the West dramatically from then on. Satsuma and Chōshū began to lead Japan in Meiji Restoration to ascend among the ranks of world powers.

Key words: the United Kingdom; Satsuma; Chōshū; Prisoner’s Dilemma; Crisis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夏 强]